

日本文化小叢刊之三

朱明著

日本文字的起源及其變遷

中日文化協會出版

日本文化小叢刊之三

朱明 著

日本文字的起源及其變遷

中日文化協會出版

日本文字的起源及其變遷目次

(一) 引 言

(二) 漢文時代

一、漢文的傳入

二、漢文盛行時期

三、漢文的衰落

(三) 假名文字

一、萬葉假名

二、平假名

三、片假名

日本文字的起源及其變遷

日本文字的起源及其變遷

四、假名的特點

五、假名的發達

(四)現代日文

一、日文的複雜性

二、日文的文體

三、新名詞的創造

(五)改革運動

一、漢字存廢問題

二、標準語問題

三、今後的趨勢

(六)結語

日本文字的起源及其變遷

(一) 引言

近幾年來，不論中國人或日本人，在說明中日應該親善提攜時，常常會提到中日同文的這句話，其實，現在中日兩國的文字，並不完全相同，這是極顯然的。我們對於日本現在的文字，如果不經過一番專門的研究，決不會懂得，不會使用的。那末所謂同文，怎樣解釋呢？我以爲在日本古代自己沒有文字而只有漢文的時候，確是可以當做文字完全相同的意思來講。但是到假名文字發明以後，和漢字混用起來，形成一種獨特的文字，語法和漢文不同，語彙有漢文所沒有的，而且還增加了一部分類同漢字的新字——和字。這種新文字，和漢文的面目大不相同，儘管採用了不少漢字，但是我們如果不下工夫去研究，去學習，便無法懂得。這種由漢文變化出來的新文字，那時日本人稱牠做「和文」「大和詞」，

或是「假名交」。這些名稱的存在，是因爲當時的漢文還保持着相當的勢力，是和新文字並行的緣故。到了現在，漢文差不多已經毫無勢力。我們現在所謂日本文字，當然就是指點「和文」而說，所以現在所謂中日同文，只是指中日兩國的文字，有一部分相同罷了。

日本的文字，既然有一部分和中文相同，在我們中國人學習起來，不消說要比別國人方便得多。事實上，在最近幾年來，學習日文的人，確是一天多一天。我們爲了研究日本，爲要認識日未，所以要學習日本的語文。有人說：「教學日語，就是實施奴化教育」，這種話，未免太武斷一點。我們知道中日兩國的所以造成這樣悲慘的事變，其主要原因之一，未嘗不是爲了彼此的不了解，彼此的認識不足。但要彼此了解，彼此認識，非彼此研究不可。換一句話說，日本應該切切實實地研究中國，中國應該切切實實地研究日本。日本文學博士塚原政次在其「興亞日本之教育」一文裏說：

「日本要活躍於東亞，必需充分知道隣國的事情，尤其要知道隣國中大國的事情。隣國中的大國是中國和滿洲國。爲了要知道他們的事情，並且要和他們的國民親善，以達到

共存共榮的目的，必須學習他們的語言。中國和滿洲的共通的語言是中國語，所以吾們要和他們維持親善的關係，也必須了解中國語。我們雖然常常說，和他們是同文同種，所以必須互相親善，可是我們向來却未想學他們的語言，這確是很大的缺陷。倘若他們努力學習日本語，我們也應奮勉地學習中國語。譬如在德國，在本國語之外，學外國語時，必學隣國法國的話，在商人方面因為以英美為顧客，所以必定學英語。正與此相同，日本人也應該努力學習中國語。所以在昭和六年四月一日起，中學校的外國語中，已得列中國語為正科。那就是在昭和六年一月二十日文部省以訓令第二號指示中學校令施行規則改正的要旨和注意事項，在中學校令施行規則的外國語一項中說：『外國語以了解普通英語，德語，法語或華語，俾能運用並資增進知德為要旨』中國語遂得列為正科。但當時如各處中學校都設中國語科，當局者也深恐教師要成問題，所以結果以中國語為正科的學校完全沒有，只有二三個中學定中國語為隨意科。在昭和七年四月一日，又訓令改正高等女學校令施行規則，其施行規則中原定外國語為英語或法語，和中學校一樣，也沒有加入中國語。姑

且不提英語，只就法語與中國語來看，其需要程度有何不可？不消說，法語實限於極少數的婦女。中國語要比較重要得多。但可見當時的文部省當局，很不重視中國語。近來忽然又力說中國語和中國現代文的必要，當然一般中學校裏又要教起中國現代文來，不能不說已經嫌遲了。」

看了這一段話，我們可以說他們是在提倡奴化教育嗎？現在日本既尊重中國的自由平等，我們為研究日本並圖各方面的便利而自動地學習日本語文，豈是奴化教育可比？不過有一點應該注意，現在有些人以為善隣教育便是教授日語，這是錯誤的。固然教授日語，也是善隣教育的一端，但却不能說善隣教育就重在教授日語。所謂善隣教育，應從各科的內容方面着想，却不是一定要教授日語。例如在小學校裏，我人依教育原理說，任何外國語都不宜教授，至於在中學以上學校，也應看各校的性質和學生的需要，而決定以何者為第一外國語，何者為第二外國語，不宜出諸強迫。所以我們一面承認學習日本語文的重要，一面要在教育的立場上，指明決非每個國民有自幼學習的必要，因為我們應注重效果，

並顧及實際需要。如果無理強迫每個國民必須自幼學習日語，像從前的小學定英語爲必修科那樣，才有被指爲奴化教育，被指爲殖民地教育之虞，好在現在並無這種事實，所以對於教學日語就是實施奴化教育的話，更不值一駁。

現在對於日本語文感覺興趣的人，一天多一天，倘若使習日本語文的人，能知道一點日本語文的起源和變遷，以及現在的日語改革運動之類，也許更能增加一點研究的興趣。本文的目的，就在於提供一點有關日本文字的常識。

(二) 漢文時代

一、漢文的傳入

日本在上古的時候，有語言而沒有文字，而且語言也比現在簡陋。關於文字，雖然有人作種種推想，以爲古代也有過怎樣的東西，但是因爲沒有證據，所以學者都不看重。小原國芳說：

「日本語言與文字，有直接的關聯；這種文字，本來是借用中國的，而且應用較遲。我們最初傳達意旨，僅以音聲。」（見日本教育史）

所以現在談日本文字的起源，就要追溯漢文傳入的時期。

從歷史上看，以公曆紀元前六百六十年（周惠王十七年）的時候，日本神武天皇在大和地方即位，這是日本立國的開端。那時候，日本的文化還沒有發達。照古事記上說，到應神天皇（公元二七〇—三一三）十五年（公元二八四年，晉武帝時）日本皇紀九百四十四年的時候（一說是應神天皇十六年），有個叫做王仁的，從百濟（古國，在朝鮮半島西南部，時唐高宗所滅）到日本，獻了十卷論語，和一部千字文。（按千字文有兩部，這裏所指點的，按時代推算，當不是梁周興嗣的作品，尙書故實云：「武帝於鍾王書中拓千字，召興嗣韵之，一日綴成。然梁書南史皆以爲王羲之書。案鬱岡齋帖題曰，魏太守鍾繇千字文，右軍將軍王羲之奉敕書。起四句云：二儀日月，雲露嚴霜，夫貞婦潔，君聖臣良，結二句與周氏同。是此書原有二本矣」（日皇就聘他教授漢文。後來像王仁這樣的人還有幾個，他

們和他們的子孫，都受日本的優遇，而且還在朝廷上担任史官那樣的重要職務。小原國芳在其所著日本教育史裏根據日本書紀說：

「在應神朝，百濟王阿直岐來朝，奉獻良馬之時，因天皇之垂詢，推舉百濟有名學者王仁以應。未幾王仁渡日，獻論語十卷，千字文一卷。并命皇子菟道稚郎子就王仁學漢籍，這是儒教之傳來，及文字傳播的開始。」又說：

「其後，在應神帝時，中國後漢靈帝之孫，阿知使五，偕子都加使五，以及秦始皇帝後裔弓月君，均率其民，來居日本。王仁之子孫，向居河內，稱爲「西文氏」；阿知使五之子孫，向居大和，稱爲「東文化」，是爲「東西史部」均以文學，歷仕於朝。」

可見日本在應神天皇時才有文字（漢文），不過當時文字的使用和漢學的研究，差不多限於貴族方面。至於平民方面，也只有九州等地，據說也有人傳用漢字，但通行的範圍很小。

二、漢文盛行時期

日本文字的起源及其變遷

直到欽明天皇時代（公元五四〇—五七二，梁武帝大同六年至陳宣帝太建二年間）即漢文傳入後二百多年，佛教開始傳到日本，同時漢文也只管盛行。有名的古事記和日本書紀的撰成，便是佛教傳入後約一百六十年的事。前者是日本皇紀一三七二年，即元明天皇時代（公元七二二年唐睿宗末年）；後者是一三八〇年，即元正天皇時代（公元七二〇年，唐玄宗開元八年）。前者是太朝臣安萬侶撰錄神田阿禮所誦之帝紀舊辭傳說而成，後世很尊重，認為是建國的經典。後者是由舍人親王及安萬侶，紀清人，三宅藤麻呂等所撰成，都是紀載日本皇室的本源，歷代的偉功勳業之類。兩書都是用漢字寫成的，不過體裁並不相同。古事記所用體裁是奇特的漢文體，把漢字作為表音及表意夾雜混用的。在古事記的序文裏說：「上古之時，言意並朴，敷文構句，於字即難。已因訓述者，詞不逮心；全以音連者，事趣更長。是以今或於一句之中，音訓交用；或於一事之內，全用訓錄。」所以有不少日本的古語保存在古事記裏。日本書紀完全是漢文體，而且是模倣史記漢書而寫成的。

依古事記所說，在體天皇時代（第十六年），由南梁人司馬達等，在大和國傳布佛教，

塑造佛像；但是正式在日本宣揚佛教的，是在欽明天皇第十三年，日本皇紀一二一二年。當時爲政治文教中心的聖德太子，熱心提倡佛教，遂普及到民間。聖德太子在法隆寺設立學問所，命僧侶研習經典，這是日本「學校」的開始；後來，定海和尚在京都設立綜藝種子智院，這是日本國民教育的濫觴。到鎌倉時代，以寺院做教育場所，這是後來「寺子屋」教育的先聲。由這些事實，可以看出佛教對於日本教育的影響，同時也可以想像到宣揚佛教與提倡漢文的相關性。

聖德太子在教育方面的功績，是獎勵學問，編修國史，與派遣留學生到中國。他所派留學生中有叫小野妹子的，在推古十五年到中國，（隋朝時），第二年回日本，據說中國派裴世清報聘，同年世清回國後，不久，小野妹子又到中國來。同行的有倭漢直福因，奈羅譯語惠明，高向玄理、新漢人大國。學問僧新漢人僧旻，南淵漢人請安，志賀漢人惠隱，及新漢人廣濟等。自從王仁到日本後三百二十餘年之間，是研究中國學術最盛的時期。學校僧旻留學中國二十五年，玄理三十三年。孝德天皇大化元年的時候，僧旻和玄理都稱做

國博士，在日本書紀上都有記載。日本設官治學，是從這時間始的。中大兄皇子即位，稱天智天皇，那時才設大學。請百濟人僧詠做「大學頭」（校長），百濟人鬼室集斯做「學職頭」（教務長），招收博士學生，開始授業，漢學更盛。在特統天皇與文武天皇之間，頒布「大寶律令」，其中包含「學令」，從學令中可以看出日本古代模倣中國而制定的學制，現在摘錄幾條在下面，以見一斑：

(一) 凡博士助教，皆取明經堪爲師首。

(二) 凡大學生，取五位以上子孫，及東西史部子爲之。若八位以上子，情願者聽。國學生取郡司子弟爲之，並取年十三以上十六以下聰伶者爲之。

(三) 凡大學國學，每年春秋二仲之月上丁，釋奠於先聖孔宣文，其饌酒朋友所須，並用官物。

(四) 凡學生，在學各以長幼爲序。初入學，皆行束修之禮於其師；各布一端，皆有酒食，其分束修，三分入博士，二分入助教。

(五) 凡經、周易、尚書、周禮、儀禮、禮記、毛詩、春秋左氏傳，各爲一經；孝經、論語、學者兼習之。

(六) 凡教授正業，周易鄭玄王弼註；尚書孔安國、鄭玄註；三禮、毛詩、鄭玄注；左傳服虔、杜預注；孝經孔安國、鄭玄註；論語、鄭玄何晏註。

(七) 凡禮記、左傳、各爲大經；毛詩、周禮、儀記各爲中經，周易、尚書各爲小經。通二經者，大經內通一經，小經內通一經；若中經即併通兩經；其通三經者，大經、中經、小經各通一經；通五經者，大經並通；孝經、論語須並通。

(八) 凡學生，先讀經文，通熟，然後講義。每旬放一日休假，假前一日，博士考試，其試讀者，每千言內，試一帖三言，講者每二千言內，問大義一條，總括三條，通二爲第，通一爲及，全不通，酌量決罰。每年經，大學頭助國司藝業優長者試之，試者通計所授之業，問大義八條，得六以上爲上，得四以上爲中，得三以下爲下。頻三下，乃在學九年，不堪貢舉者，并解退。

(九)凡博士助教，皆分經教授；學者，每受一經，必令終講；所講未終，不得改業。

(十)凡博士助教，皆計常年授講多少，以爲考課等級。

(十一)凡學生，通二經以上，求出仕者聽舉送，其應舉者，試問大義十條，約八以上，送大政官；若國學生雖通二經，猶情願學者，申送式部，考練得弟者，進補大學生。

(十二)凡學生，雖講說不長。而爛於文藻，才堪秀才，進士者，亦聽舉送。

看了「學令」中的這幾條條文，可以知道當時對漢學的重視，可以想見漢學的盛行，同時，也可知當時正是漢文獨步的時候。

那時日本的語言慢慢地發生變化：原來沒有的，增加起來；原來比較粗鄙的，變得文雅起來。尤其是一般知識份子，喜歡用漢文的語彙。在寫作方面，不消說都是漢文。不過日本人既然有他們固有的語言，對於艱深的漢文，初學自然不容易了解。對於儒家的經籍以及佛經之類，爲閱讀便利起見，便有人使用普通漢字來注音，就是現在所謂貼音的辦

法，有的簡直就注上一個日本的意義，是用了漢字譯音的辦法。另外也有人試用漢字注釋的辦法，來譯寫他們的固有的語言，以發表思想。對於漢字的用法，除了寫作漢文之外，又產生了一「假名的用法」。但當時所謂假名的用法，只是少數人的嘗試，絕對沒有流行，而日本的文字，仍以漢文爲主，這是不消說的。

到了平安時代（正是中國盛唐時候），日本派遣到中國來的留學生更多。其中如吉備真備，粟田真人，阿部仲馬呂等，都是專門研究漢學的。他們因爲受當時訓詁之學的影響，回國後講授經籍時也偏重注解，可是日本人對於漢文的研究便更進步。名僧傳教大師（天台宗）弘法大師（真言宗）等，都曾留學中國，在研究佛經之外，並精研漢文，對於漢文的傳授和漢學的發揚，也都有功績。一直到德川家康統一日本的時候，（明萬曆四十三年，公元一六五年）漢學的研究從貴族普及到民間，成了日本教育的中心，漢文也更普遍通行。

三、漢文的衰落

但在德川時代，和文在民間早已十分發達，不過在上流社會裏還未正式流行。政府當